

Chinese Village Close-up

Small Towns in China

Peasant Life in China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Chinese Gentry

费孝通先生

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

Rethinking Fei Xiaotong's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ypology

黄志辉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16年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之民族学学科经费资助

重思先声

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

Rethinking Fei Xiaotong's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ypology

黄志辉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温先声：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 / 黄志辉
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108-73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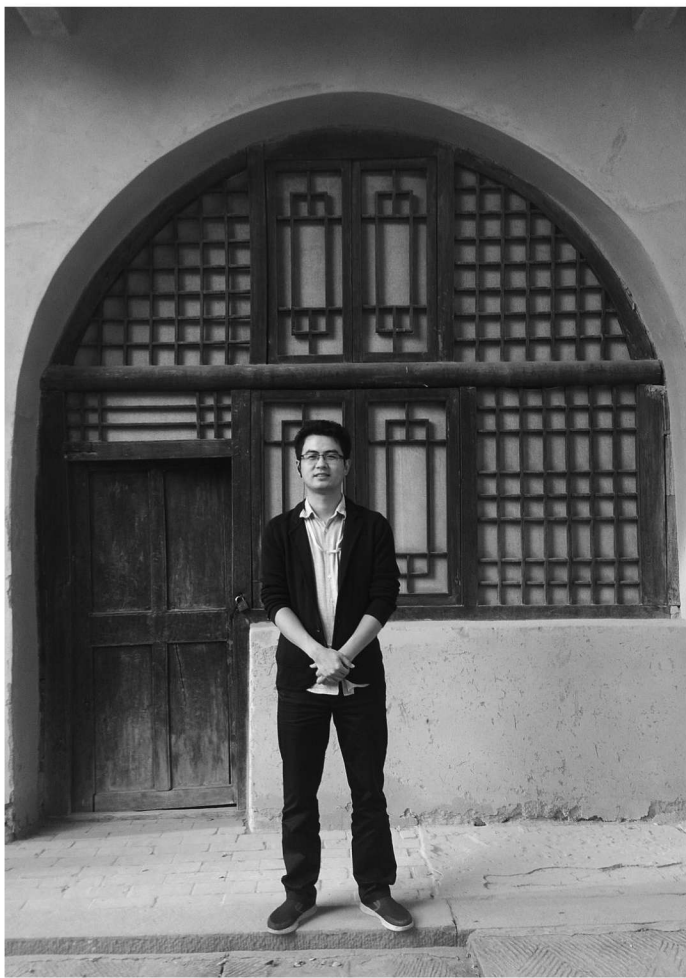
I. ①重… II. ①黄… III. ①费孝通(1910-2005)
—农村社会学—思想评论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9771号

重温先声：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

作 者	黄志辉 著
项目策划	郭荣荣
责任编辑	黄瑞丽
封面设计	晓 旭 博 翀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12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375-1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黄志辉，1984年生，江西分宜人，人类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讲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尤为关注当代工业民族志以及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展开民族地区的土地与社会研究，继续倡导“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以兼具政治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理解并解释各种土地经济形态、城乡社群分合过程和文化变迁议题。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著有《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一书。

代序

麻国庆

恩师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文距今刚好 30 周年。就在几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了这一纪念会议。在会上我提到，费孝通先生留给学界的遗产是一座丰富而又多维的知识宝库，我们理解费先生的思想也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展开。从经验的层面要从小社区扩展到大世界，从思想层面要关注先生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进程、中国思想体系的内部构造，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世界文明间对话的框架下，去理解费先生的思想判断。所以，对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讨论，更离不开这一多维的框架，不应仅就民族而谈民族。

记得我第一次陪同费师到武陵山区调研，在车上他就说他一生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汉族农民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文章。2005 年，费师离开我们后，《开放时代》杂志约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于是我写了《费先生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化》。因此，费先生的三篇大文章涉及了汉族社会、少数民族以及全球化这三个重要的领域。在这个总的领域中，费先生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中国农村、中国工业向何处去？如何通过对民族地区的调查，来认识多民族中国社会的整体形态？在具体的社区研究中，如何处理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的问题？中国思想文

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怎样通过文化自觉的转化，成为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知识构成的重要来源？中国文明如何贡献于 21 世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等。他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已经构成了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迈向人民的具体实践、全球和谐共生的理念等特征的总体性理论与实践。我在很多场合说过，费先生的学术和应用，已经构成了总体性“费孝通问题”。

费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论思考以及理论升华，呈现了开放而又立体的问题意识和知识体系。背后是费先生对于人文价值、人文发展、现代性与美美与共的未来的思考。而且，先生的为人、为学，均十分谦和、包容。我在北京大学跟随先生读博士期间，以及留学归来并任职北京大学之后，先生和我讲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话，并一再强调只能为我们后学破题引路，但开风气不为师。

对这个总体性“费孝通问题”的思考和发掘，一直是我们几代学人努力的事情。我们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燕京学派”时期，费孝通先生身边的诸多杰出青年，就有通过共同调查和实践，去认识中国社会的理念，因此产生出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在 1949 年前的“黄金时期”——“魁阁学派”。这一传统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研究。

坦率地说，“魁阁学派”以及同时代的学人，与费先生的时空距离比较接近，费先生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到我们这一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行的时期，很多现实研究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计划与市场、城乡二元体制、东部与西部的发展格差等。在此背景下，费先生的关怀更多的是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我在北大读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城乡社会学”，

博士生入学考题之一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讨论、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但我们的研究各有侧重，整体上没有形成一个“魁阁”式的学术共同体。不过，费先生早年的学术遗产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学术之路。

因此，我们这代人的研究，包括对费先生学术思想的讨论，是和我们自身的学科训练与研究旨趣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知识体系在不断变革，要求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理解费先生思想的整体性。近年来，我看到一些青年学者出版了数部研究费先生的著作，分别从社会治理、知识谱系、思想史、心态史等角度出发，提供了诸多鲜活的视角。如果说阿古什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多学者，在认识费孝通的总体性命题时，习惯于将他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那么青年学者们从某个主题的角度出发展开的追问与思考，反而让读者有独出机杼、热情洋溢之感。如果费孝通的思想与实践能与当下的社会文化议题相契合，那么说明他本来就超越了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局限。况且，在各种信息大繁荣的今天，青年学者拥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去理解费孝通以及他在 20 世纪各阶段的学术进路。所以，几代学人各有贡献，几代学人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聆听而非单向继承的关系。

本书的作者黄志辉是青年一代对费先生思想的发掘者之一。志辉曾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跟随我硕博连读，他于 2011 年 6 月毕业后，就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2016 年 4 月，我也因为各种机缘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我们目前是在同一个学院工作的同事。这些年来，我比较熟悉他的一些学术考虑。在中山大学马丁堂的课上课下，他经常会和我讨论费先生的研究议题、师承脉络；在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我放了一套群言出版社的《费孝通文集》在那里，他和几位同门师兄经常人手一本，不断翻阅、讨论。志辉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珠三角

世界工厂中的底层农业工人——代耕农群体，所以他非常关注费先生有关人口、土地、社会及变迁的论述。2013年，由我主编的“民族与社会丛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就收录了他的《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一书。该书对“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的研究，接续了费先生的相关经验研究，而且具有理论深度。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后的七八年间，他虽然还有其他的研究计划，但对费先生的关注一直没有中断过。

在与黄志辉讨论有关费先生的著述时，我逐渐知道他的几个有特点的立场，值得在这里指出。例如，他认为青年读者在阅读费孝通时，不应只是关注“文化自觉”“多元一体”等“大型”概念，还应考虑其对于现实发展问题的具体实践方略和政治经济学维度。志辉认为，关注社会重建与政治经济学，是同等重要的学术思想表达，因为重建的实践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取向要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中实现，就必须倚仗文化功能学与解释学。同时，要在田野中发现当地人的思想与文化逻辑。但如果过度地将费孝通的研究引向文化归纳学或社会哲学，就有可能与其本意有所出入。

再如，对于《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二书，志辉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更青睐于后者，理由是《乡土中国》固然很重要，书中集结了天才般的灵感，但它最初毕竟是作为教材面世的，书中的每个章节几乎都可独立，却较为零散；但《乡土重建》不同，它是一以贯之的专著，对乡村工业化和合作组织的建设方案、乡绅地主的出路以及乡村政治治理的具体路径，都有系统、连贯而独到的分析。因此，志辉认为仅仅拿着《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无讼社会”“礼治秩序”等概念，来比照当下中国的城乡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应该系统地关注《乡土重建》《中国绅士》等著作中蕴含的丰富的乡

村振兴思想。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志辉将费孝通的著作进行了如下的排序：《禄村农田》《乡土重建》《江村经济》《生育制度》《花篮瑶社会组织》《乡土中国》等。显然，他对民族志的优先趣味，影响了他对这些著作的排序。不过我同意的是，对于将要迈入实证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来说，与其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费先生提出的几个抽象概念，不如先从现实问题入手进行讨论，再回到抽象概念的思考路径，反而更有利于发展实证取向的研究。

本书的书名中有“先声”二字，音同“先生”。如果今天去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我们还能听到那里的老人一谈起“费先生”，就会眉飞色舞。但若是回溯至80多年前，开弦弓村人口中的“费先生”，可不是指费孝通，而是指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当年，费达生倾其家产，为开弦弓村的人设立现代的缫丝合作工厂，意图改善村内农民的生活，赢得了开弦弓人的信任，被尊称为“费先生”。对于农民和底层劳动者来说，那些最切实际、最接地气的知识分子，才容易被真心地唤作“先生”。而费孝通也将姐姐的公心实践称之为“复兴丝业的先声”，可谓“能指”与“所指”的合拍。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被开弦弓村人称为“小先生”，还是沾了姐姐的光。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才成了“大先生”。

费孝通被民间尊为“先生”，主要是因为他也关注富民实践，体察社会疾苦。他的早期文字中充满了苦难的重量，而在晚年文字中则洋溢着追求幸福的喜悦。诚如本书所论述的那样，中国以及中国的相关问题、发展方向，既是他的研究单位，也是他的问题域；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习惯于在中国文明的内观视野中，去研究与同时代政治经济体系适合的实践道路。他对开弦弓村、禄村、西南工厂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小城镇道路、各民族区域发展方向都给予了重点关

注。总之，费孝通的各种“先声”实践，是他从老百姓中获得尊重的根源。

在本书中，志辉将费先生的经济实践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实践，而将早期的几本经典民族志称之为“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志辉看到了费孝通早期书写的惯习，并非只是受吴文藻、派克、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人的功能理论、社区理论、结构功能论的影响，雷蒙德·弗斯以及 R.H. 托尼的经济人类学理论，也极大影响了费孝通的文脉走向。因此，他将费先生的方法论总结为“文化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诚然，不论是在江村还是在禄村，我们确实都能看到费先生对“土地与地租”“劳力与收入”“资本与工资”等议题展开的细致分析，而这些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们必不可少的分析要素。不过志辉总是提醒读者，费孝通对土地、劳力、资本的价值计算，从来都存在多种计算方法的来源。地方性的或中国文明内在的知识体系会提供一套价值观，世界资本体系会提供另一套价值观。只是当后者以霸权姿态和强势话语出现，前者就会受到挤压乃至毁灭。

本书不断提及的费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微观社区的经济人类学研究指南，也是宏观世界的观察棱镜。志辉在开篇中这样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庸俗’的权力学说和简单的平等召唤，它的价值论立场和对劳动力、商品、土地以及资本的分析性关照，可以与民族志对‘人’与‘物’的深描结合，并且对各个区域中出现的民族政策实践、资本运作以及社会关系提出批判与反思。此外，民族志的文化视野可以矫正普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地方与国家、地方与全球之间寻求一条适合的文化自觉道路。”在这样的表述中，我非常同意青年学人去追寻类似的“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技术分析去判断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又通过民族志的文化解释路径，

将技术分析拉回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基调中来，丰富当下中国民族志的新人文时代。

此外，本书还总结了费孝通的类型学。对于《费孝通文集》中出现的“城市”“权力”“家庭”“经济”“知识分子”等类型，志辉都一一加以梳理。将费先生各种零散的类型学系统表述出来，这是非常有益的工作。尤其是《费孝通先生的城镇类型观——兼论小城镇与城乡协同发展中的区域道义》一文，不仅呈现了费先生丰富的“城观”，还在以往关于农村社区、民族走廊、地方区域等几种常见的类型学表述外，增加了重要的新维度。而费先生有关城镇的主类型、次类型分析，也被志辉前后连贯地表述了出来。此外，志辉通过对比分析各种类型观，烘托出“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发展伦理”这一重要学术判断，为当代的城镇发展提供总体性的参照。

总而言之，我比较同意志辉的判断，费先生有关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各种类型学的表述，也是前述有关总体性“费孝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本书是入道不久的青年学人对经典思想的追索，志辉希望站在费孝通的知识基础上，看得更远一些。虽然，本书中有些篇章的讨论还稍显不够深入、延展还不够充分，但是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努力、激情和对学术真谛的孜孜追求。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青年学人对本土经典的解读还是太少了，希望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麻国庆

2018年4月15日于北京魏公村

前言

潘光旦先生曾将天下学问的变化视为一个类似于“梭子形的公式”：起初笼统单一，中段分化复杂，末了又归于新的笼统或综合。^①不同时代的学问如水一般，或化分为“派”，沟壑纵横；或综合为“汇”，江河聚海。在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作的序言《派与汇》中，潘光旦对费孝通不吝美言，但时刻提醒费孝通，不要因为保持“派”的立场而忘了“汇”的综合。功能主义的学问有其磅礴之处，但大庭院也可能有小气象。潘光旦先生不断告诫，在学派林立的时代，无论是社会思想研究者还是社会理想主义者，应该结合各家短长，共工合作，融为新“汇”，开新人文精神风气研究之先河。要祛除天下思想派系分流之弊，“关键均在一个汇字，治标的路莫忘旧汇，治本的路是寻求新汇”。^②没有对往届旧宗的真正尊重，就难以有锋利的新锐远见；没有对新时代进行综合的勇气，就难以呈现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知识。关键的是，理论与思想的分歧即使再多，只要在产生分歧的同时，不忘合作，既发展自身又顾全别人的努力与观点，就有可能汇合一个新的人文时代。潘先生作为费先生的老师，将对学生的批评隐于期盼之中，这种师情友谊，可谓真兮切兮。而费孝通先生也未负潘望，他

① 潘光旦：《派与汇》，《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代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298页。

② 潘光旦：《派与汇》，《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代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一生保持学术丰产的同时，时刻秉持潘光旦所追求的中和位育以及新人文思想，筚路蓝缕，在寻求富民道路的同时开启了文化自觉的时代。只要翻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民族学界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先生的学问已成为时代之汇了。哪个研究者不在自己的文献回顾部分引用几句费孝通的话呢？

费孝通先生去世之后，中国学术界对他的态度似乎又在验证潘光旦有关天下学问的规律性总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的趋势体现于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对费先生的赞美与继承以各种形式涌现。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者继续引据费先生的概念与思想，但有不少形式主义的文献回顾者将费先生置于脚注或参考文献里，而不顾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与费先生有关的论坛，这些论坛就像年度祭祀仪式一样跟随主流声音的节奏，不断抬出费先生来巡游，当然其中不乏洞见；还有一些文本阐释者与实践方案的继承者更多的是在学术舞台的背后耕耘，敬惜费先生留下来的字纸，寻求新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路径；此外，希望与这位学科先贤对话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多，费先生的文本不断被搬演，但阅读的态度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费先生去世之后，各种唯我至上的解释路径不断地对费先生的学术体系进行“靶向”批判，“费孝通为什么不关注这个问题”“费孝通没有注意到那个理论概念”“费孝通忽视了不该忽视的问题”……通过张扬费先生的“缺漏”和自我的光环，俘获身处历史迷障中的观众。

对费先生的批评或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但他的去世似乎构成了一个分水岭。1949年以前，费先生就曾围绕乡村建设与民族国家问题，与一系列学者有过直接的论争。此后，埃德蒙德·利奇与莫里斯·弗里德曼在方法论上的评价构成了全球学界关注的学术事件。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东亚社会学界对费先生一片叫好声时，日本学者横山广子

就直接对话费先生，过度的乡土意识不是一种现代性自觉，应该“离开土范畴”去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方案。^①在费先生晚年尚属思维敏捷的时候，这样的对话声音很稀缺。新的世纪开启后，我还在大学里读社会学本科专业，清楚记得费先生是课堂上、文字中、会议里不断被搬演的学术神话，虽然彼时费孝通尚在人间。但自2005年之后，中国社会学界才开始“积极”地与费先生对话，一系列有关“新乡土中国”“后乡土中国”“告别乡土”“走出乡土”的研究不断登场，但很遗憾费先生已经去世，回声有限。但为什么在费先生去世之后，我们的对话者、批评者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呢？

“赞美”与“批评”的声音重新在历史中分流，像笔者这样的学生娃或年轻学者，就在这些分流之声中聆听、呼应、喝彩、批判，却经常缺少对费先生总体文本的系统阅读与反思。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后生来说，缺乏与这位隔代大师的直接互动，也没有各种鲜活的记忆叙事，除了聆听“50后”“60后”的老师们说费先生过去的故事之外，理解费孝通的最好工具只能首选阅读他写作的以及与他有关的文字。虽说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宣称“作者已死”，从而“怂恿”读者去构建后现代时代的主体性。但是，如若忘了“旧汇”，没有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基础，建构从何构起？

业师麻国庆教授经常告诫学生，要从整体的视角看待费先生一生的学问。麻老师将费先生总的文字综合为三篇文章，分别是从汉人社会、民族地区以及全球化三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中国社会与新的时

①（日）横山广子：《离开“土”范畴——关于白族守护神总称的研究》，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9—120页。

代。^①这种思路与王铭铭教授的“三圈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麻老师有关“三篇文章”的说法直观地体现了费先生的整体研究历程，以及汉人社会、民族地区和全球社会的跨区域互动体系。我在关注珠三角这座世界工厂中的“代耕农”群体时，麻老师就不断提醒我要去注意费先生的村庄土地研究是如何兼顾文明的内发视野与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的接榫过程。这让我在面对快速流通的工业商品、流动的劳力以及不断流变的地权问题时，能够同时坚持文化价值论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去解释流动与跨界的现象。

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这几年，我经常听到的先贤名字之一便是“费孝通”。一是作为这里具有深厚学统的象征出现，二是费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及其承担的民族识别工作，不断被关心国家秩序的学者提及。这些当然都极为重要，而且契合这里的学术关怀，但对费先生有关中国总体性问题的关注，由于过于坚持固守“少数民族”与“边疆”的领域而被削弱了。费先生有关东部地区的城市与乡村研究、有关全球社会与中国文明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各种现代化的发展方案，要么被搁置了，要么被简化了。那种提倡将“三篇文章”的交叉视野同时放置在海内外各个民族研究区域中去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践行。我初来民大工作的几年，每次去民族边疆地区进行调查，都觉得很惶惑。因为按照中央民大最近二十年的知识生产惯例，我原有的知识储备生产出来的知识，就会与这里的“场域”显得格格不入。因此，除了去学习其他民族研究“标准”之外，我一遍又一遍地追问《费孝通文集》，希望能得到一些答案。追问的结果就是这本著作，并得出这样的判断：从费孝通总体思路中考虑出的大多数问

^① 麻国庆：《费孝通先生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题，可以突破“少数民族”名相的研究限制，面对客观而复杂的综合性现实以及民族学应迈向总体性社会科学或人文研究的需求，提醒我们要摆脱过去的那种局促性研究视野。

关于费先生的各种研究已经浩如烟海了，阿古什、张冠生、杨清媚等人均可谓从费先生总体的人生实践与叙事文本出发，生产了诸多有继承和开拓意义的知识，并各有侧重。费先生的那些学生们（均是我辈的老师）以及真正关心费先生总体文本的研究者，至今仍在不断地总结、发掘、补充完善“汇”的时代。我极为尊重这些不急于告别“汇”、不急于匆匆开启派系的前辈、同仁。诚恳地说，我个人能力有限，无法与这些研究一一系统对话，只能下一些笨功夫，立足于费先生留下来的文本以及自己关心的内容，阐释一些以往还不够充分重视的议题。本书中每个章节的内容，虽然并不都是新发现，但至少均是尊重费先生总体文本的不懈努力，而不是通过大刀阔斧的肢解文本，以达到毁宗破汇、另立新说的目的。

“政治经济学”并非新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老师——雷蒙德·弗斯和 R.H. 托尼为他种下了文化价值理论的种子，并在其以后的几本民族志中生根发芽。强调费先生民族志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学科教育传统中过度赋予的“功能主义”形象，另一方面是要提醒自己及同仁，未来中国的民族志知识生产，还要在很长时间里继续持有文化价值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这是兼顾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费先生的研究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间有很大区别，但对社会平等与繁盛的追求是相同的。而且，费先生早期的民族志以及后来几乎所有的实践记录，所关怀的切入点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路径是一样的：从土地与地租、劳力与收入、资本与工资以及转型时代的商品流

动等角度出发，去探求全面的富民实践与协调的城乡发展方案。关键的是，费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与文化价值理论相并列叙述，而且是以中国文明的内发视野为前提的。所以，其一生追求的平等富强，最终要通过重返土范畴的自我审视、以文化自觉的新人文思想来引导。

“类型学”就更是费孝通自己及相关研究中的老生常谈了。费先生一生贯通了从微观至宏观的各种分析单位，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强调其类型学的多样性，也是希望补充学界不断复述的村庄社区、区域模式以及民族走廊等几个有限的类型学形态。实际上，费先生对“城市”“权力”“家庭”“经济”“知识分子”，甚至于“社会变迁分析视角”等方面，都有过系统的类型表述。关键的是，他不仅阐释了类型的内涵和类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展开了关系的类型分析，从而在方法论上打通了各分析单位的联结逻辑。与韦伯不同的是，费先生的类型学立足于直接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停留在理论的云霄之上。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山大学的谭同学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的高朋老师、云南大学的张亮老师和我几个人，一致认为研究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形态的民族志应该具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而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带有对国家与地方政治、资本与生产体系、消费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综合观察视角，它关心现实和发展问题，可以作为民族志的切入点。谭同学教授在 2010 年就专门发表过文章，强调转型期的中国研究需要重视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① 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庸俗”的权力学说和简单的平等召唤，它的价值论立场和对劳动力、商品、土地以及资本的分析性关照，可以与民族志对“人”与“物”的深描结合，并且对各个区域中出现的民族政策实践、资本运作以及社会关系提出

^① 谭同学：《再论作为方法的华南——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视野》，《思想战线》2010 年第 5 期。